

希腊史研究在中国

■白春晓 陈悦

1908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的康有为(1858—1927年)到希腊旅行,写下了他的《希腊游记》。在游记中,他不仅详细地描述了雅典卫城、科林斯卫城上的阿佛罗狄忒神庙和科孚岛上的阿喀琉斯宫等名胜古迹,而且多次比较了古代希腊(主要是雅典)与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之处。今日读来仍饶有趣味。作为变法改良的代表人物,康有为自然最关注古代中、希政体的差别。对于雅典所开创的民主政治,他的见解不仅在晚清士大夫中,而且在以后中国的政界与知识界都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之主权一统与希腊之民权分治是由于地理自然形势所致。“共和民权,只易行于小国,……故希腊之能创民权政治者,实即希腊能之。若吾中国之大,虽有圣者善政,必不能创此义。”同时,他认为,由于现代“物质发明,铁路、电线之输地为之”,所以“民权、国会、公理也,义之至也,势所必行也”“希腊之政法,遂为法于天下”。可以看出,他承认起源于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现代世界是大势所趋,但他断定中国由于自然环境与历史传统的不同,要行民权仍“待其时耳”。他游希腊,写希腊,读史阅世,兼及中西,孜孜念念的是他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希腊文化的兴趣更加浓厚。他们对古希腊的神话和哲学尤感兴趣。在希腊历史领域,不少大学开设有西洋史课或外国史课,其中都会向青年学生介绍古希腊的历史。1933年,罗念生(1904—1990年)先生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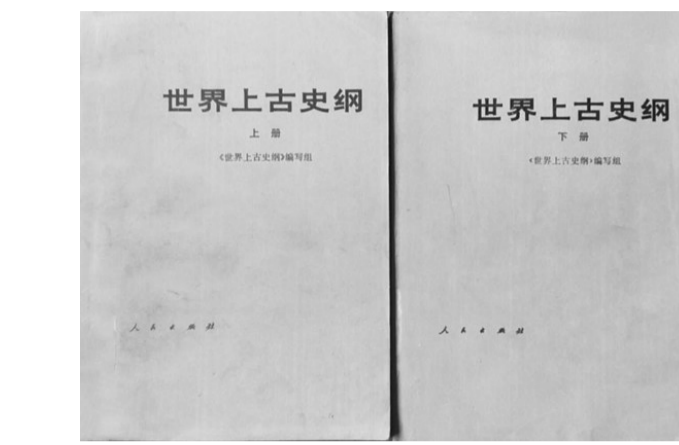
希腊,在美国驻雅典古典学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学习,成为中国第一位来希腊实地学习古典文化的留学生。此后,他笔耕了约半个世纪,译介了大量古希腊的文学作品。1952年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与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他晚年所著的《论古希腊戏剧》为中国读者系统梳理了古希腊悲剧与喜剧的特点与发展过程,既是一部通俗亲切的文学理论专著,又是一部杰出的古希腊戏剧简史。1987年12月,雅典科学院授予他“最高文学艺术奖”以表彰他的贡献。

在严格意义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系统地研究古希腊史。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一方面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另一方面有计划地组织学者们对古希腊史的历史文献与研究著作进行翻译。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翻译成中文的。“文革”结束之后,古希腊史研究更是进入了新的繁荣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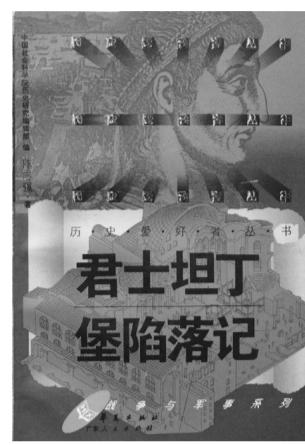
对于中国古希腊史学科的建设,必须提及的人物是林志纯(1910—2007年)教授。林志纯1950年,在上海求学。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他被调往位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尤其醉心于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的比较研究。1955年,苏联派出世界古代史专家到东北师范大学讲学,培训中国各高校的青年教师,帮助中国建立世界古代史学科。林志纯代表中方与

苏联专家合作指导了这一世界古代史研究班,培养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世界古代史的学者。1984年,在他与其余几位教授的倡导下,中国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成为中国最先设立的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及古典学学科的研究机构。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在1980年代后又涌现出一批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者,其中古希腊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现任所长张强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黄洋教授(他为雅典卫城与卫城博物馆翻译了首本中文的官方导览书)等都是这个研究所培养的。

除了教学以外,林志纯还重视原始文献的翻译与国外学术信息的介绍。例如,他参与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并早在1962年就向中国人介绍了线性文字B的译读情况。1979年和1981年,林志纯主持编写的《世界上古史纲》(两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独立研究撰写的世界上古史研究专著。1979年,在他的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此后的二十余年,他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古希腊史与整个世界古代史研究。他著名的观点是否认城邦为希腊、罗马社会所独有,而认为古代近东、印度与中国等地区都经历过城邦阶段,都在早期国家建立时含有原始民主的遗存。他认为,中国先秦时代的政治与古希腊城邦有相似性,但这一带有民主色彩的传统被秦、汉以后的专制帝国所淹没,中国走



《世界上古史纲》书影



《君士坦丁堡陷落记》书影

向民主需要发掘中国固有的民主传统。他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和讨论。2012年,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以林志纯的笔名“日知”设定了“日知世界史奖”,旨在表彰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学者。

相比古希腊史,现代中国学者对于拜占庭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陈志强教授(1952年至今)对于中国的拜占庭史研究的发展功不可没。1980年代,他由中国教育部派出到希腊学习,并于1994年在位于塞萨洛尼基的亚里士多德大学(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取得了历史与考古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一直在南开大学教授拜占庭史,已撰写了一百余篇有关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学术论文,编著和翻译了二十

余余有关拜占庭帝国的著作,其中《君士坦丁堡陷落记》是中国学者第一本系统介绍拜占庭历史的学术专著。他既向国际学界深入介绍了中文古代典籍中关于拜占庭帝国的史料,又向国内知识界系统精细地传播了拜占庭历史、文化以及国际拜占庭学的新趋势、新成果。在他与同事们的努力下,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关拜占庭学的研究中心(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他为中国的拜占庭史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且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中国拜占庭学者。2013年10月,他被希腊政府授予“最高文学艺术奖励章”。

在希腊史和希腊文化研究领域,还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中国前驻希腊大使。杨公素大使编著的《希腊近代史》以一名资深外交官的眼光回顾了希腊近代的历史脉络,引人入胜。杨广胜大使不仅编译过《希腊神话》,而且撰写过有关希腊

语言发展史的论文。2000年,杨广胜大使又协助希腊船王瓦西里斯·康斯坦塔科波罗斯(Vassilis Constantacopoulos)在北京大学创建了希腊研究中心,之后他担任了该中心的顾问与教授,亲自为年轻学子讲授希腊的语言和历史文化。继北京大学之后,近些年来,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南大学等高校也纷纷成立了希腊研究中心。进入21世纪后,更有一批在欧美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古希腊史研究者学成回国(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敬教授和洗若冰博士,他们分别在美国和德国研习过古典学)。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学者不断继承前辈的治学经验,同时合理吸收国外同行的前沿研究成果,必将为希腊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希两个同样拥有久远历史的民族在学术上的交流也会更加热烈。

一个中国画家怎么看待西洋画?或者说一个中国画家怎么看待西方艺术?前提需要说清楚的是中国画家还是中国的画家?你是地道的中国画家吗?或许还可以再问:还有地道的中国画家吗?很多事情一反问,虽然有点无厘头,但却能问出一些问题。

在网络时代里,孕育中国国传统书画和古诗词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一百多年来,对于传统古诗词来说,几乎是断崖式的变更。若对比古诗词,大家仿佛觉得中国书画处境也许比古诗词的生态环境相对好一点,还没有像古诗词那样失去了太多的依凭,或者说,虽然失去了强大的依凭,但又找到了新的落脚点。

视觉艺术的特点之一,就是有不需翻译的优点,就像外国人看中国画那样,并不需翻译,我们看西方绘画也不需要翻译,熟悉中国文化的汉学家或西方中国美术史专家,看中国画更不需要翻译了。近些年,大量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画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著作不管从考古学、

社会学、图像学,还是从其他学科领域切入,总会让读者阅读起来感到别有洞天。但是,若回到绘画本体,看这些西方汉学家聊中国画,却总有一种“隔”的感觉。同样,我们看西方绘画或西方艺术是否也存在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呢?现在的传统绘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古代文人的士大夫环境,我们看传统绘画与古人看他们的绘画是否也有差异吗?假如有差异,那差异又在哪里?

潘天寿先生说,要拉开东西方美术史两座大山的距离,但在他的视觉形式里又处处可以找到可以用现代主义绘画形式构成分析的理念。再如林风眠的水墨实践,你再怎么不承认他画的是中国画,但他的画面上又处处流露着东方式温婉含蓄的审美。对于这种现象,让我们感到面对东西方绘画的时候,时常会涌上一个疑问,这就是:艺术家在搞什么鬼?

写到这里突然想读鲁迅的短文《拿来主义》。在文章开始,鲁迅说起20世纪初徐悲鸿、刘海粟等扛着古画去欧洲以及国民政府



西尔万的作品(左,1990)与叶永青的作品(右,1994)

艺术家在搞什么鬼

■王犁

在巴黎举办展览的那件民国初期艺术界的大事,接着又提到梅兰芳去莫斯科并唱道欧洲。“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主动送出

去显得自己有货,又见得大度。“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从鸦片到美国电影,因为是“送来”不是“拿来”的缘故。接着笔头一拐,鲁迅先生开始讨论“拿

来”,“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对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有骗来,抢来,合法继承来,还有做女婿换来,好像没有什么担心后怕,但也有辱头、昏蛋和废物。鲁迅先生提醒我们“拿来主义”哪怕面对自己祖先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危机。对于别人“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的习惯,一百年过去了“拿来拿去”好像不是问题,也没有太多陌生的状况。对于外来的“拿来”,鲁迅先生说:“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还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近半年来,因为叶永青抄袭比利时画家西尔万(Christian Silvain)事件,发展到对“八五新潮”以来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全盘否定声浪,夹杂着之前西方艺术“阴谋论”,大家隔岸观火,有焦灼与煎熬,有看客般叫好,也有稍稍皱眉思考着中国现当代艺术未来怎么办。说句实话,我并不关心一个“艺术家”的抄袭问题,倒关心“八五新潮”以来所谓现代中国艺术家“拿来主义”

的好处。想来想去,我放弃对具体某一件作品的评论,不管艺术界怎样地鸡飞狗跳,大文化的交流仍然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开放的社会环境。

假若没有近四十年的开放与交流,没有互联网带来的便捷,或许,你连谁抄袭谁都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时刻准备去拯救全人类。就像叶永青抄袭那么多年我们才知道,还不是交流少、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只能让“艺术家”借机搞了个鬼吗?在中国往往是保守容易开明,闭关容易开放。晚清郭嵩焘那代也是“叫打”都是“爱国者”,“言和”基本“卖国贼”。艺术本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最柔软的地带,千万不要上升到“你死我活非黑即白”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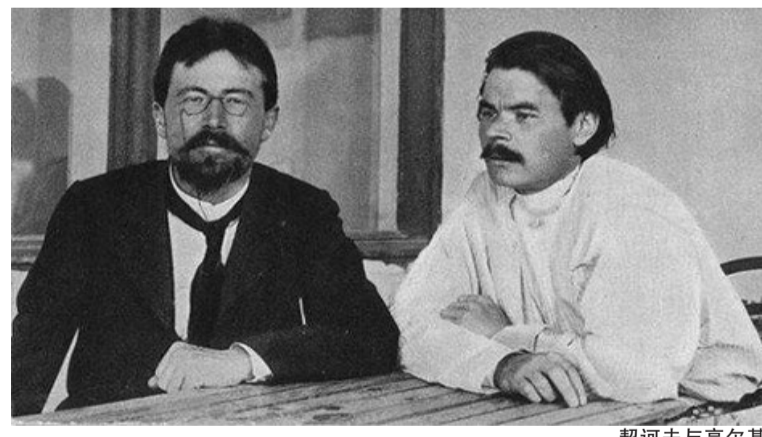
面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我们仍然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其实这那里仅仅是面对外来文化的提醒,我们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要避免像鲁迅先生讽刺的“穷青年”得了“一所祖上大宅子”后,又会有几种可能的后果……

在众多青年粉丝中,马克西姆·高尔基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位。

契诃夫收到高尔基第一封来信是1898年10月。那时高尔基刚刚步入人文坛,对契诃夫充满了崇拜和敬仰。他在信中说:“我想向您表露从少年时代就对您怀抱的真挚热烈的喜爱。我读您的作品,经历了多少妙不可言的时刻。有多少次我一边读着,一边流泪。有时愤怒得像掉进陷阱的狼一样。”高尔基还随信寄上自己刚出版的作品《特写与短篇小说集》,请契诃夫指教。

契诃夫对这位素不相识的粉丝并没有怠慢。1898年11月16日,他给高尔基回了一封信:“十分尊敬的阿历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的信和我早已收到,而且早已准备给您写信,可是各种各样的事妨碍我动笔,请您务必原谅。我一有空就坐下来,给您详细写一封信。昨夜夜里我读了您的《戈尔特瓦集市》,十分喜欢,因此考虑先给您写这么几行,以免您生气,把我想得不好。我为我们的相识非常非常高兴。”

契诃夫说的不是敷衍了事的客套话。过了半个月,他果然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契诃夫在信中问:“您问我对您的短篇小说有什么看法。我可以告诉您,



契诃夫与高尔基

契诃夫与高尔基

■李辰民

您具有无可怀疑的才能。比方说,在《草原上》这篇小说里,您的才能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力量。我甚至因为这篇不是我写的而产生了嫉妒。您的感觉出色。您善于塑造,也就是说,您在描写事物时眼睛看得见它,手摸得着它。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在这封长信里,契诃夫也坦率地指出了高尔基的缺点:“依我看您缺乏节制。您好比剧院里的

一个观众在表达自己的快乐时那么不加节制,因而妨碍自己和别人听戏了。您的风景描写过于冗长,本来两三行就可以了,您却写上一整页。那些描写女人或者恋爱的场面,也使人感到缺乏节制。读者总是希望描写得紧凑一点,简短一点,要不他们就会兴味索然,甚至筋疲力尽。”在后来的信里,契诃夫多次批评高尔基在文学描写中过多的“拟人化”

“不加节制”和“缺乏优雅”,建议他去掉像“狗崽子,狗东西,呆鸟”这样的字眼。

契诃夫对高尔基的喜欢是由衷的,对他的缺点的批评又是毫不留情的。

高尔基也是真心把契诃夫当成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每当有新的作品问世,高尔基总是首先寄给契诃夫,请他指教。看到好的作品,契诃夫更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连夜复信,大加赞扬。高尔基决定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献给契诃夫,于是写了一段献词寄给契诃夫审阅。契诃夫回信说:“一般说来我反对把任何东西献给活人,不过这是泛泛而论。就个别情况而言,您把《福马》献给我,除了快乐和荣耀,我只能鞠躬道谢了。献词请您尽量不用多余的字眼,只要写上‘献给某某’就够了。”在后来出版的小说扉页上,果然印着一行献词:“献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马·高尔基”。

鲜为人知的是,契诃夫还是高尔基戏剧创作的向导。高尔基是从看契诃夫的戏开始对戏剧感兴趣的。契诃夫为了鼓励高尔基写剧本,亲自带他到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演员们排练,帮助他熟悉舞台、布景、灯光、道具,而且介绍他和大名鼎鼎的导演丹钦科和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相识。高尔基的第一部剧作《小市民》就是在契诃夫影响和指导下完成的,也是在契诃夫推动下,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获得成功的。自此,高尔基的《小市民》《底层》等剧作,也像契诃夫的《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经典作品一样,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长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1902年4月,因为高尔基参与革命小组的活动,遭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令,俄国皇家科学院撤销了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为了声援高尔基,抗议沙皇压制言论的行为,契诃夫和阿罗连科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退出皇家科学院,毅然放弃自己的名誉院士称号。

1904年7月,契诃夫在德国疗养胜地巴登维勒病逝。高尔基第一时间撰写长文《安·巴·契诃夫》,深情缅怀和沉痛悼念自己的导师。

尽管高尔基的成长经历和契诃夫不一样,他们的政治信仰也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对文学艺术的探索,对美的追求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由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发展成为亲密无间、心心相印的朋友关系,伙伴关系。这种情况并非特例。除了高尔基之外,还有布宁、库普林、魏列萨耶夫等著名作家,开始都是契诃夫的铁杆粉丝,然后逐步发展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